

日治初期「土匪」與泰雅族大豹群之互動探討

高俊宏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日治初期，由於乙未戰爭過程中敗陣而四散的漢人兵勇，結合了清領時期藏匿在內山的「土匪」，形成了一股複雜的勢力。這群「土匪」一方面為維持生存，持續騷擾近山地帶的村民。另一方面，卻又打著反日的民族主義旗幟，號招民眾參與並藉此壯大聲勢。1898 年兒玉源太郎的「匪徒刑罰令」對於土匪造成極大的壓迫。然而，這些流離於山區的勢力並未散去，反而更往內山撤退，並且與泰雅族大豹群結盟，形成了特殊的「原漢合作」模式。

本文以日治初期日方對三角湧與暗坑方面「土匪」的追擊過程，以及 1907 年發生在插天山隘勇線上的「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日方所稱）為主，透過文獻探討、口述以及現場踏查為方法，探討「土匪」多次轉進到當時的大豹群「蕃地」，甚至一起抗日的過程，並分析其中的互動模式與相關因素。其中，主要聚焦在族群互動、經濟關係與地緣關係等不同的領域探討，並且進一步比較「土匪」與大豹群、馬武督群之間的互動差異。

關鍵字：「土匪」、大豹群、隘勇線、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地緣關係

壹、前言

筆者過去進行泰雅族大豹群（Topa / Mbngciq）耆老的口述過程中，分別從耆老馬瀨·有狩、尤敏·樂信、林德桃、黃肇宏等，得知大豹群與「土匪」結盟的事蹟。¹ 這樣的敘述與一般原漢衝突的印象著實不同，箇中原因引人好奇。因此，本文以「土匪」與大豹群互動的作為切入點，挖掘這段歷史，並且進一步探討彼此之間的互動。第一節「三角湧、暗坑、獅子頭山沿線『土匪』」，概述乙未戰爭之後，三角湧、暗坑、獅子頭山範圍為主，包含其中的雞罩山、白石鞍山、十六寮等地的「土匪」事件。探討其與大豹群之間的關係。第二節「『土匪』與大豹群之連結，以秦鱸魚為例」，以多次出現在文獻中的秦鱸魚為例，採個案的角度持續分析。第三節「『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中的『土匪』」，則是探討 1907 年「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裡所記載馬武督方面的「土匪」與大豹群領袖瓦旦·變促的結盟，並且連帶梳理馬武督方面的「土匪」脈絡。第四節「『土匪』與大豹群之間的互動因素探討」，則從大豹群與漢人交往的歷史過程、經濟因素、地緣關係的角度切入，探討彼此之間的互動成因。

本文所使用的「土匪」是採日本文獻上的稱呼。然而，為了避免過度單一形成「壞人」的詮釋，加上其確實有抗日的作為，因此特別冠上「」以為註記。另外，為了接近時代感，本文主要的空間地名採取當時的舊稱，例如三峽以三角湧稱之、安坑以暗坑稱之，其他次要地名則仍採行今日的稱呼。

貳、文獻分析

本文文獻分為日本與臺灣兩方面，並以少數的口述為輔。日本方面首先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以及《臺灣憲兵隊史》，兩者分別由警察與憲

1 耆老關於「土匪」之相關口述，時間與地點如下：馬瀨·有狩口述，2019 年，優霞雲部落；尤敏·樂信（宗民雄）口述，2019 年，佳志部落；林德桃口述，2018 年，上溪口部落；黃肇宏口述，2020 年，基國派部落。以上皆為筆者紀錄。

兵單位所記載。其中，《臺灣憲兵隊史》因為歷任四屆的憲兵隊長的撰述，編輯上略為跳躍，須小心對照。《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則以北、中、南分區敘，過程相對清楚。其他日方參考文獻分別為：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編著的《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以逐年的方式簡述臺灣守備隊在日治初期的各種行動。這份文獻與前述的警察、憲兵的記載有不少重疊之處，本文僅摘錄必要的部分。另外，漢文與日文版的《臺灣日日新報》，以報導的方式呈現不同的資訊，亦為重要參考文獻，唯訊息出現落差時，仍以軍、警、憲等單位為主。此外，省文獻會出版的《臺灣北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收錄了當時警方的文件與筆錄，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其他日方文獻的部分，包含了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的《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下冊），（原：理蕃誌稿）》、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臺灣史料稿本》、王學新編著的《日據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系列（1 與 3）、國史館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系統、《三峽殉難警察官吏之事蹟調查書》等，分別提供了重要的資訊。關於「土匪」通論的部分，則參考檜山幸夫、東京子的《總督府檔案與臺灣統治》、秋澤烏川的《臺灣匪誌》以及水野遵的〈臺灣の土匪〉等著作。

中文方面，翁佳音的《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側重在 1895 年 12 月到 1902 年 7 月的「土匪」抗日事蹟，以臺灣在地觀點的分析，加上大量的文獻搜羅，是相關的研究重要的參照。陳漢光的《臺灣抗日史》與林熊祥主修的《臺灣省通志稿，卷九：革命志抗日篇》，具一定史料參考價值，但偏向於戰後強化民族主義的詮釋，使用時必須多一層判別。吳德功的《讓台記》，則敘述了作者個人對於乙未戰爭發生的過程，有臺人第一手史料的意義。此外，傅琪貽的《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從日本「理蕃」的角度拉出了不同視野。同樣是傅琪貽的《1900-1907 大豹社事件，Watan Syat 抗日事件》，則是以瓦旦·變促為主軸，對於大豹群戰役的過程有詳盡的記載。另外，傅琪貽主編的《大豹風華：泰雅族大豹群對日抗戰 120 週年紀念特輯》，收錄了多位耆老的口述，提供了族人方面的觀點。

此外，羅烈師等著的《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收錄大豹群後裔伊凡·諾幹的文章，與1947年樂信·瓦旦的〈臺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情書〉，皆為族人方面的重要文件。

碩士論文方面，陳怡宏的〈忠誠和反逆之間——1895-1901年間臺北、宜蘭地區「土匪」集團研究〉，深入解析北臺灣「土匪」的各層因素。張瓊文的〈土地、社會與國家：新店地區的空間性轉化〉、陳明正的〈日治時期新店沿山地區的山林開發〉、戴翊丞的〈清代臺北安坑通谷的族群空間分布與互動關係〉，聚焦在新店方面的相關脈絡，亦有參考價值。森田孝利的〈日本統治初期臺灣的治安維持制度〉、洪秋芬的〈日據初期臺灣的保甲制度(1895-1903)〉則就法律與制度面提供了見解。

口述方面，大豹群耆老關於「土匪」的述說屬「隔代轉述」，印象較遙遠，但仍值得斟酌參考。本文分別紀錄、轉載了後裔林昭明、林昭光、林富美等族人的口述，並以傅琪貽、三峽文史研究者林炯任、三十閔窪隘勇後代林先生與提到五寮「出土匪」的陳先生作為延伸。另外，前述的馬瀨·有狩、尤敏·樂信，林德桃先生與黃肇宏對於大豹群與「土匪」合作的口述，因為相對簡要，本文僅在前言提到為止。

參、三角湧、暗坑、獅子頭山沿線「土匪」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指出，「土匪」有以下三個來源：首先是乙未戰爭潰敗的義勇軍所組成；其次是原本就分據各個山頭的「草賊」；第三則是攻臺過程中遭到殺戮的平民之親屬，轉而投靠「土匪」。²該沿革誌另以「海賊之亞流」、「民族主義傾向」、「風土與生活」、「械鬥風氣」、「行政軍紀鬆弛」以及「反日風氣」來探討「土匪」的形成背景。³另外，《後藤新平文書》所收錄的〈臺灣ノ土匪〉一文指出，日本來臺以後「土匪」種

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柏璦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上卷）（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年），頁14-15。

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柏璦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上卷），頁10-14。

類增加許多，包含（一）、國事犯。（二）、盜賊。（三）、國事犯兼盜賊。（四）、借名國事犯之盜賊。（五）、兵吏誤認之盜賊。（六）、盜賊脅從之盜賊。（七）、為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復仇之盜賊。（八）、為復權其職業財產之盜賊。（九）、失去衣食而偷生之盜賊。（十）、自大陸偷渡求倖之盜賊。⁴該文認為除了第二、四與十項之外，其餘七項都是日本政權抵臺以後才「被製造出來的土匪」。⁵總而言之，日方雖然初步梳理了「土匪」的成因，卻仍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從而有污名化的觀點，例如水野遵關於皮膚病、慢性梅毒的形容。⁶至於臺灣方面也有多位學者有所論述，其中，翁佳音以經濟、社會與宗教等三大因素來探討成因，⁷可謂較具本土化的觀點，唯受篇幅限制，相關議題暫不作延伸。

「土匪」組成的複雜，間接也顯示了日治初期社會的混亂與重組。乙未戰爭敗陣下來的清國舊兵，在戰敗之後結合本地人藏匿於山區，加上原本即游離於山區的盜匪（草賊），以及遭到日方屠殺的民眾之親屬等，基本上成為日方眼中所謂的「土匪」。⁸而清國舊兵中又以勇營的部分特別值得探討。清代勇營制度約莫始於太平天國時期，為了補充正規軍八旗綠營能力上的不足所致。⁹在組成成員上也基本有別於地方性的團練（團勇），而是多半經由招募制度，且頗有訓練的「練勇」所組成，¹⁰擔當起清帝國在太平天國到甲午戰爭之間的國防主力。¹¹而在乙未戰爭期間，除了勇營之外，也有來自本地的「土勇營」，「土勇營」多半由臺灣人所組成，其領導者也多是地主、

4 陳怡宏，〈《後藤新平文書》選譯：「臺灣之土匪」〉，《臺灣風物》，第 51 卷第 2 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2001 年），頁 17-18。

5 陳怡宏，〈《後藤新平文書》選譯：「臺灣之土匪」〉，《臺灣風物》，第 51 卷第 2 期，頁 17-18。

6 水野遵，〈臺灣之土匪〉，收入《臺灣論二》（東京：拓殖大學，2003 年，原發表於 1898 年），頁 86。

7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研究（1895-1902）〉（臺北：稻鄉，2007 年），頁 111-136。

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上卷），頁 14。

9 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臺北：中央研究院，1973 年），頁 16-17。

10 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頁 8-9。

11 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頁 51-52。

墾隘者與樟腦業者，經常結合社會上的游離分子，並與來自清國的勇營有所爭執，成為地方的武裝勢力。¹² 乙未戰爭以後，上述種種武裝勢力與地方頭人，部分選擇加入抗日的行列，成為日方所謂的「土匪」。¹³

以北部而言，主要的「土匪」為簡大獅、林火旺、陳秋菊、盧阿野、林季成、詹振、詹番等人。1895年12月，新竹胡阿錦、宜蘭林李成、文山堡陳秋菊、詹振企圖奪回臺北、宜蘭、基隆等地。¹⁴ 12月31日，大屯山、觀音山與紗帽山燃起信號的烽火，「土匪」圍攻臺北城，焚燒東門、南門外的房舍，並從東南門外襲擊，最終遭到日軍拒止於城外。¹⁵ 錫口街（松山）方面也遭到「土匪」佔領，鐵路切斷。士林、板橋、淡水、三角湧、宜蘭等地亦烽火綿延。¹⁶ 相關事件的空間分佈在《臺灣史料稿本》的〈臺北附近土匪蜂起ス〉裡有所呈現（圖1）。面對蜂起的「土匪」事件，日本於1898年11月緊急頒布律令第24號「土匪刑罰令」，該法條被視為日本近代相關法令中最為嚴苛之一，不問抗日與否，對於聚眾暴力者一律定義為「匪徒罪」。¹⁷ 為了避免「土匪」逃往山地與原住民結盟，日方對淺山地帶也轉以嚴守「民蕃」界線為主。¹⁸ 1901年末到1902年5月間，日方大抵上完成了全島「土匪」大掃蕩，當時北部的清剿以大屯山系（北山、燒煥寮、金包里等）、錫口、汐止、雙溪（灣潭、頂雙溪）、樹林龜崙嶺（橫坑仔庄、羌仔寮）、暗坑一帶的獅子頭山、十六寮、雞罩山以及三角湧附近的大豹群邊界山區為主。

12 陳怡宏，〈乙未戰爭：臺人肆應與權力場域變動〉，《臺灣學通訊》，第87期（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2015年），頁19。

13 陳怡宏，〈乙未戰爭：臺人肆應與權力場域變動〉，《臺灣學通訊》，第87期，頁19。

1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上卷），頁50-51。

15 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編著，《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上）》（臺北：捷幼出版社，1991年），頁225-226。

1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上卷），頁63-72。

17 檜山幸夫、東山京子，《總督府檔案與臺灣統治》（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頁69-70。

18 藤井志津枝（傅琪貽），《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臺北：文英堂，1996年），頁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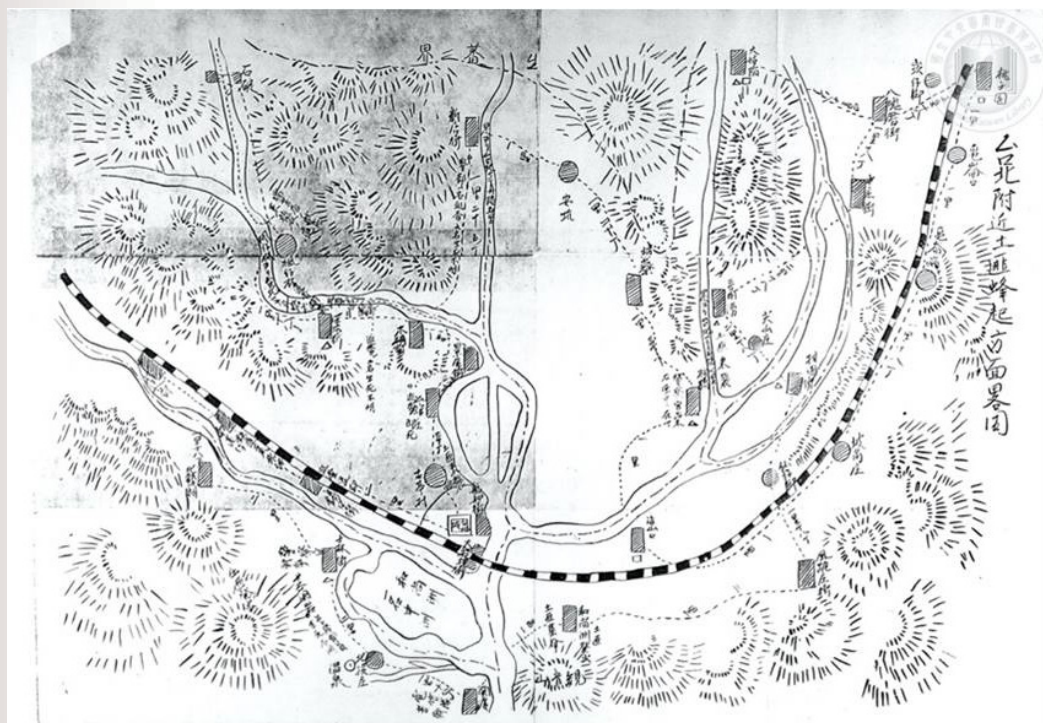


圖 1 〈臺北附近土匪蜂起之範圍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臺灣史料稿本》明治 29 年 1 月 1 日（編者，1896 年），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三角湧在清領時期即是「土匪」聚集之處。馬偕提及，當時的三角湧是一個二千人左右的小鎮，附近山區住著一群「土匪」，居民日子過得很不安穩。「土匪」入城時還會高唱：「恁靠官，阮靠山！」¹⁹。乙未戰爭期間，日軍遭到三角湧的蘇力、黃曉潭、蔡國良、黃國添、張龍安等人率眾抵抗，義軍「開地窟以陷馬足」、「沿山埋伏」，²⁰造成日軍頗大傷亡。陳怡宏推敲，1896 年元旦的臺北城事件中，三角湧是當時主要的聯繫中心之一。這可能與乙未戰爭期間，當地曾經因為激烈抗日而遭到焚村的事件有關。²¹樟腦業出身的蘇力之所以會參與 1896 年元旦的圍攻臺北城，便是被三角湧屠殺事

19 George Mackay, 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前衛，2007 年），頁 148。

20 吳德功，《讓台記》上卷（無出版資訊，1897 年），頁 69。

21 陳怡宏，〈忠誠和反逆之間：1895-1901 年間臺北、宜蘭地區「土匪」集團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54。

件所激起。²²

不僅三角湧，今日新店的暗坑、小暗坑、十六寮、獅子頭山等地過去也是「土匪」匯聚之地，而這些地方也都與大豹群存在著地緣關係。《臺灣憲兵隊史》記載，1896年三角湧一帶的「匪首」是孫城，並與當時獅子頭山的鳳劉（劉鳳）、王火來、王溪和、南勢角周日、大安寮簡連城等人互通。²³事實上，上述地區的「土匪」組成更為複雜，除了各自為政以外，並經常結合原本在地的無業者。張瓊文提到，新店在清領時期已有許多原本在山場工作的勞動者，日治時期因為工作權遭到剝奪而轉向抗日。²⁴

1896年元旦事件以後，日方開始對上述地區進行追剿。同年3、4月，憲、警混合部隊與「土匪」在十六寮遭遇，「土匪」戰敗，首領王成與李本源逃脫。²⁵10月，三角湧附近「土匪」出沒，日方派遣大多和中尉率隊前往小暗坑偵查，雙方在十六寮西南高地發生衝突。²⁶過程中，大多和中尉頸部遭子彈貫穿，另外有四名兵員受傷，後續在大嵙崁守備隊的增援下才得脫困。²⁷11月7日，三角湧巡查樺山資寶等五人在搜索十三添庄與打鐵坑庄時，遭到陳豬英等六十餘名「土匪」襲擊，日方五人被殺。其中，樺山被割去首級，身體並棄置於犁舌庄。²⁸12月8日，日方兵分三路進攻打鐵坑，其中一路與白石按山上的「土匪」交戰，最後追擊到大豹群領域邊界的白石按山（鹿窟尖）南峰，燒毀草寮十四座，擄獲槍枝、彈藥與刀劍若干。另外一路則在雞罩山附近發現「土匪」四十餘人，在施以攻擊之下，「土匪」轉往「蕃人出沒的山林」（大豹群領地）藏匿。²⁹12月14日，日方橋本中隊由十六

22 陳怡宏，〈忠誠和反逆之間：1895-1901年間臺北、宜蘭地區「土匪」集團研究〉，頁203。

23 臺灣憲兵隊編，《臺灣憲兵隊史》（編者，1932年），頁120。

24 張瓊文，〈土地、社會與國家：新店地區的空間性轉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頁69。

25 林熊祥主修、黃旺成纂寫，《臺灣省通志稿，卷九：革命志抗日篇》（臺北：臺灣省文獻會，1954年），頁36-37。

26 〈小暗坑附近的匪況〉，《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1986年11月5日，版3。

2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上卷），頁97-98。

2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上卷），頁98。

29 臺灣憲兵隊編，《臺灣憲兵隊史》，頁119-120。

寮進攻獅子頭山，在山頂擄獲了幡旗一面，上面註記「臺灣土匪國 詹化龍 林飛鳳 光緒丙申十一月」等字樣（圖 2）。³⁰除了令人懷疑是詹番或者劉鳳等人的化名以外，也說明了獅子頭山在當時被「土匪」設想成是一個獨立王國的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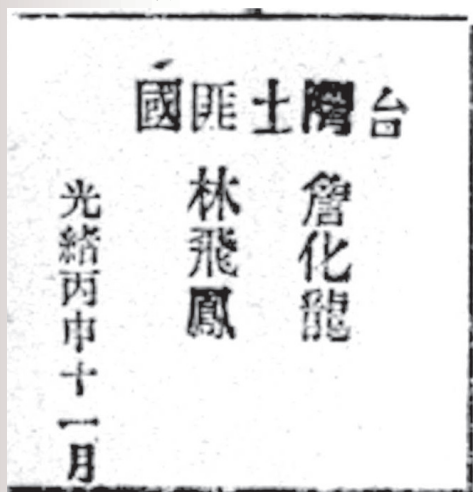


圖 2 「臺灣土匪國 詹化龍 林飛鳳 光緒丙申十一月」。

資料來源：〈獅子頭寮の討伐〉，《臺灣新報》（日文），1896 年 12 月 18 日，版 3。

12 月 23 日，田邊大尉率領的一個中隊在雞罩山與打鐵坑一帶遭到「土匪」襲擊，經反擊之後殺死了十多人。隨後，日方諜報指出：「匪徒三百餘名潛伏於十三添庄、九空山與蛤仔窟等地」。³¹27 日，日方襲擊「土匪」的巢穴九空，抵達以後發現大多數已經逃往金面山（鳥嘴尖）。³²有鑒於三角湧郊區成為「土匪」基地，日本組成憲警混合部隊，再次向犁舌尾、十三添、打鐵坑等地進軍。過程中，首領黃文開、孫成率領二百多人化妝前往三角湧預謀舉事，中了日方的埋伏，死二十餘人，被俘三十餘人。³³31 日，日方在溪南

庄逮捕了的蘇來、蘇壽等十二名「土匪」。³⁴

1897 年 3 月，日方再次進攻雞罩山，並與八十餘名「土匪」遭遇，「匪首」林園被捕。³⁵後續，詹振與部下二百多人佔領獅子頭山，在與日軍作戰失利以後，撤往深山。³⁶5 月 26 日，日軍繼續往獅子頭山方面搜索，發現仍

30 〈獅子頭寮の討伐〉，《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1896 年 12 月 18 日，版 3。

31 臺灣憲兵隊編，《臺灣憲兵隊史》，頁 126-127。

32 臺灣憲兵隊編，《臺灣憲兵隊史》，頁 126-127。

33 林熊祥主修、黃旺成纂寫，《臺灣省通志稿，卷九：革命志抗日篇》，頁 38。

34 臺灣憲兵隊編，《臺灣憲兵隊史》，頁 130。

35 臺灣憲兵隊編，《臺灣憲兵隊史》，頁 162。

36 林熊祥主修、黃旺成纂寫，《臺灣省通志稿，卷九：革命志抗日篇》，頁 39。

然有大批「殘匪」滯留在山區，包含了十六寮一帶近兩千人，雞罩山一帶也有數百人。³⁷當時的深坑山與三角湧兩地的「土匪」已然形成互通的狀態。³⁸同年6月，「三段警備法」實施，將全島分成一等地（危險）、二等地（不安定）以及三等地（安全），並以軍、憲、警分別合作治理。³⁹當時，三角湧與新店暗坑分屬二等地，劃分為第九警察區與第一憲兵警察區，⁴⁰當地局勢之不穩可見一般。

1898年9月，三角湧發生重大襲擊事件，王赤牛與秦鱸魚等三百多人兵分兩路起事，最後以三角湧辦務署遭到焚毀收場，唯辦務署裡的公款與鴉片並未被奪取。⁴¹這起事件震動了日方，由於此次「土匪」大多來自暗坑及獅子頭山一帶，日方決定「今起安坑附近擬包圍後討伐之」，⁴²以三路包圍的方式進行打擊。⁴³除了圍堵暗坑與獅子頭山以外，並且預計搜索十六寮、雞罩山等地。在該次行動的〈安坑討伐〔伐〕一件書類〉文件附圖裡，可以看到圖中標示著「土匪時時集合庄」的地點，分別為五城、大粗坑、二叭子、車仔路、後頭厝等地（圖三），呈現出了當時暗坑一帶的「土匪」據點。該次「安坑討伐」行動造成了「土匪」當下四散，其中有不少甚至逃往大溪的金面山方向。⁴⁴三角湧方面「土匪」被殺五十七名，暗坑方面被殺一百五十一名。⁴⁵加上同年11月「匪徒刑罰令」的發布，三角湧與暗坑的「土匪」於是漸次沉寂。1899年詹振以暗坑的車仔路為基地，試圖再聚集四百

37 〈殘匪復聚〉，《臺灣新報》（漢文），1897年6月10日，版1。

38 〈土匪通信〉，《臺灣新報》（漢文），1897年6月16日，版1。

39 森田孝利，〈日本統治初期臺灣的治安維持制度〉（臺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頁106。

40 陳明正，〈日治時期新店沿山地區的山林開發〉（臺北：臺北教育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頁23。

4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上卷），頁144-146。

42 郭嘉雄編著，〈高收第二一三八號〉，《臺灣北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79年），頁367。

43 臺灣憲兵隊編，《臺灣憲兵隊史》，頁184-185。

44 郭嘉雄編著，〈高收第二二一六號〉，《臺灣北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頁371。

45 陳明正，〈日治時期新店沿山地區的山林開發〉，頁25。

餘人，在日方擴張包圍網以後，最後只好撤入「蕃地」（大豹群領域）。⁴⁶ 1902 年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提出「土匪招降策」，全島利誘或誘殺處死達 539 人，另外臨時處分（不審判而直接處決）者高達 4043 人。⁴⁷ 從「匪徒刑罰令」與「土匪招降策」的設立、民間保甲制度的建構，搭配屢次「大掃蕩」行動，導致 1902 年時「土匪」大致上已經被消滅，⁴⁸ 其餘則部分轉進到原住民領域。



圖 3 「安坑庄土匪防禦略圖」

資料來源：收錄於「安坑討伐〔伐〕一件書類（第二號、元臺北縣）」（1898-01-01），《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9118001，圖面 1。

整體而言，三角湧的「土匪」與雞罩山、十六寮、暗坑乃至於獅子頭山

46 林熊祥等，《臺灣省通志稿》，卷九：革命志抗日篇》，頁 43。

47 藤井志津枝（傅琪貽），《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頁 122-123。

48 秋澤烏川，《臺灣匪誌》（臺北：杉田書店，1923 年），頁 10-11。另見洪秋芬，〈日據初期臺灣的保甲制度（1895-1903）〉，《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1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年），頁 439。

有明顯的地緣因素，這個區域皆與大豹群傳統領域相連，經由不少「土匪」轉進大豹群領域的動態，可以理解原漢之間有一定的默契與包容性，相關因素後續繼續探討。然而，上述諸多的「土匪」例子比較是以事件為主，倘若從個案的角度切入，則或許能夠看到更為具體的關係，以下就三角湧辦務署襲擊事件中的秦鱸魚進行探討。

肆、「土匪」與大豹群之連結，以秦鱸魚為例

1902年6月，日方記載一群「土匪」襲擊銅鑼圈派出所，結束以後退往「托瓦巴社」（トワバ，大豹）。後續，日方調遣大嵙崁守備隊封鎖三角湧、咸菜礮以及銅鑼圈三地，並搜索三角湧以東的托瓦巴社，殺死七、八名「土匪」。⁴⁹同年9月的另一份報導指出，早先有一批被稱為「民蕃混合之土匪」、「寄食於大豹社，提供情報，教唆蕃人劫掠附近腦寮，強索糧食槍枝。並扮作蕃人，騷擾行旅良民，襲擊銅鑼圈派出所以及咸菜礮一帶腦寮」。⁵⁰上述兩則報導應屬同一事件，也同時提到與大豹群之間的關聯性。對於上述文獻，學者王學新解讀到「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秦飛龍（鱸魚）竟然能夠寄宿於大豹社，此似乎與日後北部山區的『蕃匪』有關」⁵¹，首先勾勒出了秦鱸魚與大豹群的關係。

秦氏出身於海山堡三角湧狗硿口大埔庄崁腳47番戶的農家。⁵²乙未戰爭時任三角湧勇營的「管帶官」（營官），⁵³曾經率領手下參與三角湧分水崙包圍日軍坊城少佐部隊的戰役。⁵⁴日本佔臺後，因為遭人恐嚇告發前述經歷，遂逃往十六寮山區藏匿，逐漸累積了七百餘名手下，其中包含前述的孫城、

4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上卷），頁161-162。

50 〈順匪反抗〉，《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2年9月21日。

51 王學新編著，《日據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3》（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6年），頁99。

52 王學新編著，〈秦飛龍歸順取及 件 水返腳〉，《日據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年），頁97。

53 王明義等編，《三峽鎮鎮誌》第18章（臺北縣：三峽鎮公所，1993年）。

54 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2000年），頁84。

劉鳳、許嘴、陳豬英、黃文開、盧火、簡阿手、廖石獅、廖石勇等九名「小頭目」。⁵⁵ 1896 年 11 月，日本第二十二聯隊山脇少佐命令部隊攻擊「榛莽繁鬱人跡決」的獅子頭山，當時山上的「土匪」領袖有秦鱸魚、莊成、陳水、游打石等人。⁵⁶

1897 年，獅子頭山「土匪」連同秦鱸魚等共計四百餘人歸順。然而，秦鱸魚卻又在 1898 年因為被人冒充以其名義搶劫良民，於是再度入山藏匿。⁵⁷ 一直到三角湧辨務署焚燒事件中，秦鱸魚與來自獅子頭山的許嘴、許餅、廖大番等人，率領大批人馬出擊。當時，秦鱸魚是以坐轎的方式出現在事件現場，旁邊還有數十人警戒。⁵⁸ 同一事件，總督府文獻記載為秦鱸魚與陳赤牛等三百餘人，兵分二路襲擊三角湧。⁵⁹ 上述兩份文件都可以看到秦鱸魚的名字，顯見其在該事件中的重要性。

後續，日方發動暗坑與獅子頭山方面的追剿，秦鱸魚帶了三十多人往大豹群領域藏匿。⁶⁰ 同年 10 月，日方間接從瓦旦·燮促方面得知，大豹群領域裡潛伏了高達六百名的「土匪」。⁶¹ 日方派遣時任三角湧辨務署主記的市川澱，前往角板山與大嵙崁前山總頭目岱木·宓嚇（Temu Bsyal，義盛社）情商，試圖實施「以蕃治匪」的策略。岱木·宓嚇在得到槍枝、彈藥、酒品以及藥物等物資贈予，並且允諾可以分得「土匪」所遺留的物資之後，遂決定行動。⁶² 這次的討伐行動最後雖然撲空，卻也留下了一張〈土匪巢窟附近略圖〉（圖 4）。顯示了藏匿在大豹群裡的「土匪窟小屋」是在九空與圳子頭山一帶的山區。⁶³

55 王學新編著，《日據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 3》，頁 97。〈順匪反抗〉，《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9 月 21 日，版 5。

56 〈匪賊剿盪錄（一）〉，《臺灣新報》（日文版），1896 年 11 月 26 日，版 2。

57 〈匪賊剿盪錄（一）〉，《臺灣新報》（日文版），1896 年 11 月 26 日，版 2。

58 王學新編著，〈安坑討伐一件書類 第二號〉，《日據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 1》，頁 197。

5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上卷），頁 146。

60 王學新編著，〈秦飛龍歸順取及 件 水返腳〉，《日據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 1》，頁 97。

61 王學新編著，〈安坑討伐一件書類 第一號〉，《日據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 1》，頁 170。

62 王學新編著，〈安坑討伐一件書類 第一號〉，《日據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 1》，頁 170。

63 推測圳子頭山應為今日三峽的五寮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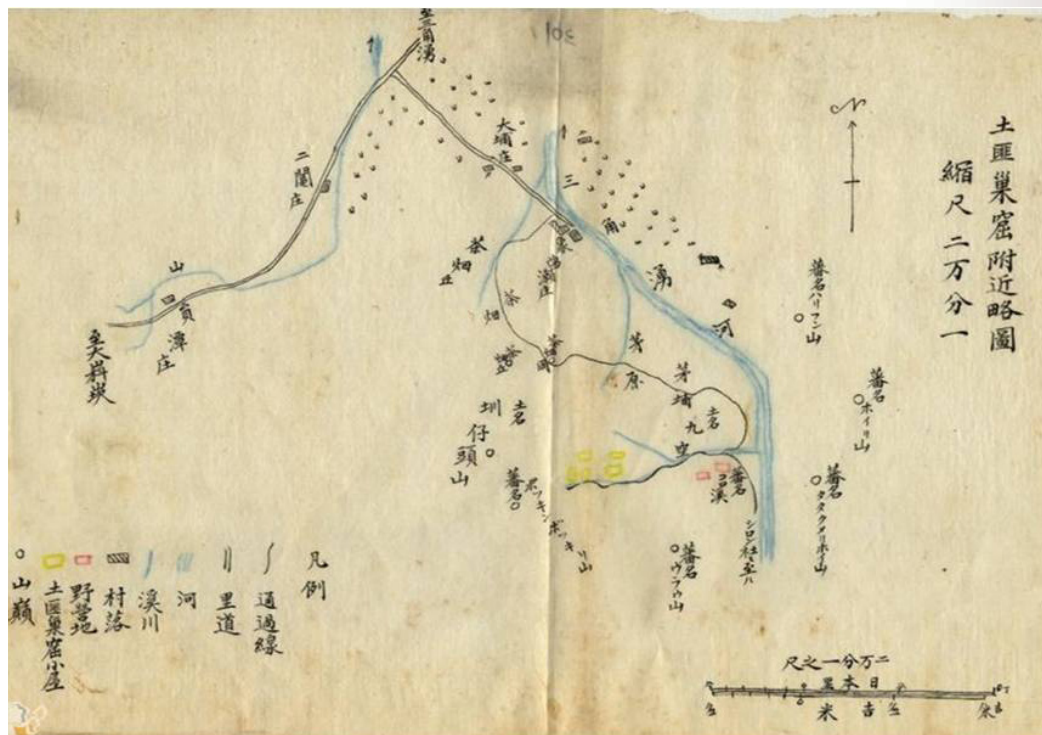


圖4 「土匪巢窟附近略圖」

資料來源：收錄於「安坑討伐〔伐〕一件書類（第一號、元臺北縣）」（1898-01-01），《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9117001，頁303。

1898年12月，日方進攻北山的簡大獅，造成了詹番、陳洛源、邱阿南、秦魯（爐）魚（此時已經出現在臺北山區）等所謂的「小匪首」遭到進一步追剿。⁶⁴12月13日，秦爐魚打著「傘旗」，結合了從觀音山的詹番（虎旗）、陳總理（龍旗）等，沿著樹林的龜崙嶺一路抵達鶯歌尖山埔附近的二甲九庄渡口，預計返回獅子頭山基地。眾人在烏塗坑庄、山員潭庄途中遭到日軍的狙擊。⁶⁵一部分人被擊潰於金瓜坑，⁶⁶其餘則潛入雞罩山下的阿四坑。⁶⁷隨後，

64 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編著，《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上）》，頁883-884。

65 郭嘉雄編著，〈大嵙崁秘第25號〉，《臺灣北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頁140。

66 郭嘉雄編著，〈土匪情況報〉，《臺灣北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頁137。

67 郭嘉雄編著，〈匪情報告〉，《臺灣北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頁149-150。

雙方在雞罩山下爆發激戰，「土匪」往阿四坑東南方撤退，最後在雞罩山東北的草叢又被堵獲，總計二十餘名被殺，殘餘再轉往大料坎方向。文獻記載，秦爐魚還因為欺瞞詹番部下，加上錯誤的帶路方針而在九鬮大寮地（大寮）而遭到殺害。⁶⁸ 但是，後來又傳出秦爐魚在水返腳（汐止）投效日本，甚至謠傳出現在新竹的新埔庄。最後，在一份 1901 年的文獻中，化名為「李菜包」的秦爐魚（又名秦飛龍）遭判死刑，結束了草莽的一生（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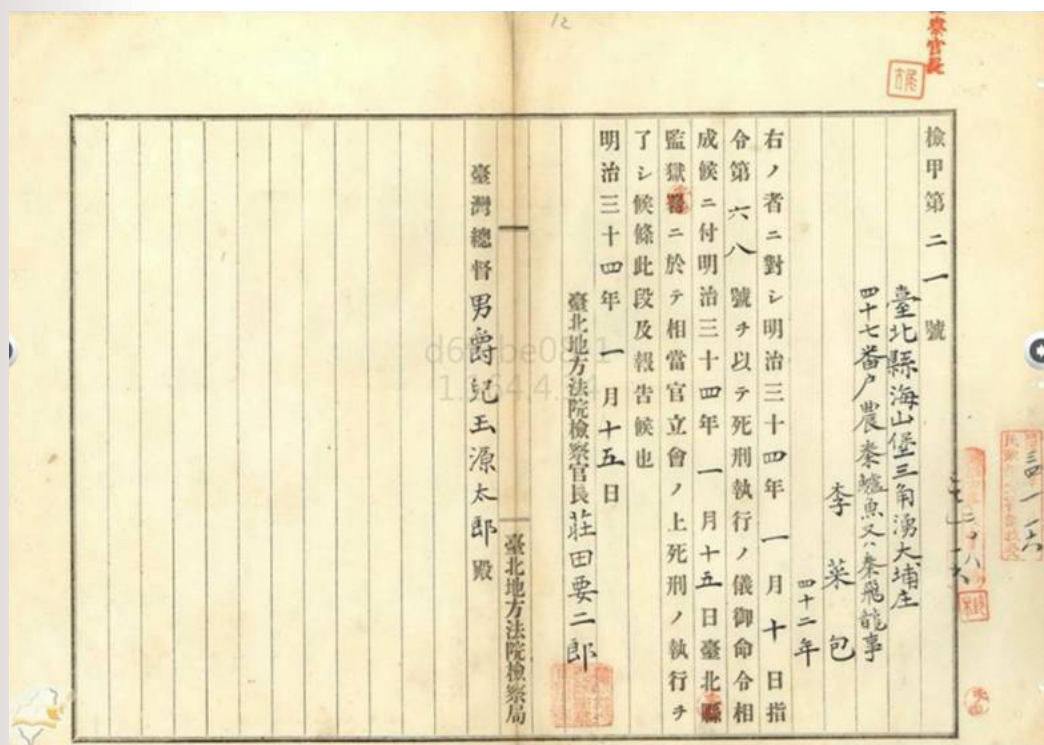


圖 5 李菜包（秦爐魚，又稱秦飛龍）死刑執行

資料來源：收錄於「李菜包死刑執行」（1901-01-10），《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0639002。

日方對於秦爐魚的記載多屬負面表述，然而，三峽在地人的評價卻不一樣。設立於 1911 年的三峽協靈祠（二十聖王公）石碑沿革上，記載了秦鱸

68 王學新編著，〈北山討伐關係類綴 第三〉，《日據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 1》，頁 81-83。

魚、陳山茶等二十人參加蘇力統領的三千義軍對抗日人，最後為了保衛鄉土而「殺身成仁」（圖6）。據廟祝表示，「二十聖王公」骨骸是1907年大埔、五寮等地被槍決的抗日義士，唯詳細情形仍待考據。⁶⁹

在《三峽殉難警察官吏之事蹟調查書》中，以「蕃匪蜂起」地區形容三角湧地區，⁷⁰由「蕃匪」一詞可以看出這一帶「土匪」與大豹群的關係。根據上述資料的判讀，可以推測當時「土匪」多屬於臨時、寄居的成份居多，雙方並未看到具體的聯盟關係形成。然而，大豹群接納「土匪」的事實相當清楚。另外，從秦鱸魚遊走在獅子頭山、大豹群領域乃至於樹林龜崙嶺等地，可以看出「土匪」不穩定的生存條件與到處游離的狀況。一直到1906年日方發動大豹社方面隘勇線前進，在大豹群面臨生死存亡之際，境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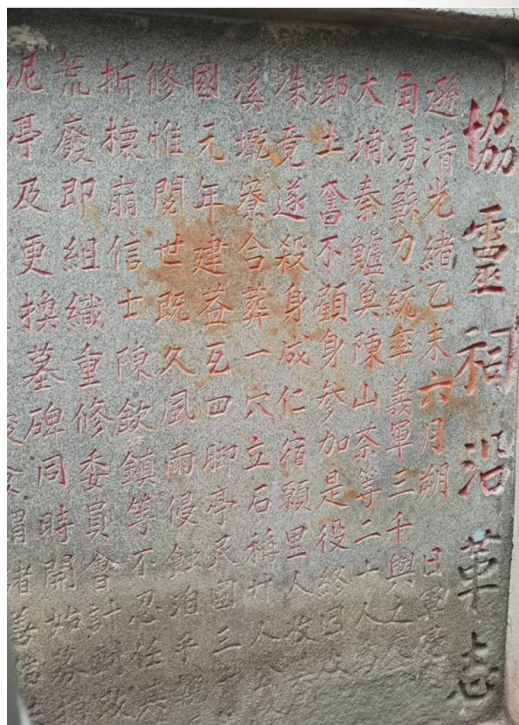


圖6 三峽協靈祠沿革志，上面刻有秦鱸魚等人的抗日事蹟

資料來源：筆者攝。

的「土匪」態度似乎有歸順之意。日方記載：「傳聞該番中尚有一二餘孽之漢匪。頗悟我隘線不久必能擴張。將有一番討伐……」，⁷¹然而，隔年發生在插天山隘勇線上的「大崙崙蕃匪騷擾事件」，則已經看出原漢之間較為緊密的合作，以下就此繼續探討。

69 協靈祠不具名廟祝口述，2023年，三峽協靈祠，筆者紀錄。

70 作者不明，《三峽殉難警察官吏之事蹟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1935年）。

71 〈桃屬進紮隘線狀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7月3日，版3。

伍、「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中的「土匪」

10 月 7 日（按：1907 年）在桃園轄內山地發生大嵙崁群及匪徒騷擾事件。此前之 5 月間設施插天山方面之隘勇線時，大嵙崁群因受潛伏於馬武督附近之匪徒煽動極力反抗阻擾，後來經交涉和解後繼續施工完成。詭計不得逞之匪徒企圖奪取該隘勇線內之地區以便棲身，於是千方百計煽動教唆無智原住民……當時匪徒揚言攻陷個隘勇監督所、分遣所及隘寮後攻擊大嵙崁，進而攻擊桃園破壞鐵路，並揭起「去明復清」及「大谷王」之旗幟虛張聲勢……⁷²

前文提到 1902 年「土匪」大致被消滅。同年，日方即以「同謀」的來形容大豹群與馬武督群掩護「土匪」之事。⁷³從這裡可以再次看到「土匪」並未完全被消滅，而有部分轉進「蕃地」的現象。1907 年插天山隘勇線的前進，除了繼續追擊殘餘的大豹群、瓦解泰雅族北大嵙崁群（Msbtunux）之外，同時也不排除有清剿「土匪」的動機。1907 年 5 月到 6 月，日方與原住民在枕頭山激戰，日方戰死警部以下 63 人，受傷 190 人，⁷⁴在耗費山砲彈、小銃彈、機關砲彈、擲彈、爆裂彈等 70 餘萬發，⁷⁵日方終於完成了長達十一日里多的隘線，沿線修築了四個監督所、39 個分遣所與 276 處隘寮，大部分路段通有高壓電。⁷⁶而此時「土匪」此時已積極鼓吹抗日。⁷⁷

72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誌稿）》，（第一卷，下冊）（南投：臺灣省文獻會編印，1997 年），頁 473-474。原書日文版為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1938 年出版）。

73 〈桃園蕃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7 月 26 日，版 3。

74 〈枕頭山死傷者〉，《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臺北：1907 年 7 月 20 日，版 2。

75 〈新隘線之完成（續前）〉，《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7 年 8 月 27 日，版 2。

76 〈插天山新隘勇線（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7 年 9 月 6 日，版 2。

77 〈大嵙崁隘線の成功〉，《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1907 年 8 月 23 日，版 2。

同時，由於隘勇線畫過原民領地，加上同年 9 月角板山交易所發生大豹群族人偷竊事件，⁷⁸ 總總因素埋下了後續「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的爆發。10 月 7 日，數百名原住民、「土匪」與逃逸隘勇猛攻插天山隘勇線上合脤監督所、控社分遣所以及角板山監督所等，戰火一度延燒到咸菜礮。⁷⁹ 由於當面的桃園廳與深坑廳警力不足，日方緊急從臺北、基隆、彰化、斗六、嘉義、鹽水港、臺南、蕃薯藔、鳳山、阿緱等地調來警力，最終才壓制下來。過程中，「土匪」與大豹群瓦旦·變促的關係被提到數次：

時忽有潜伏桃園廳下馬武督社附近之匪黨，竝外大豹社土目瓦丹那毛等，甘言煽動。⁸⁰……暴動之原因。係三十二三年間。逃入蕃界之土匪。煽動而起也。該土匪約有十五六名。⁸¹……來襲桃園隘勇線之敵魁，即大豹社土目「瓦丹·阿妹」也。彼于今春前進隊行動之際，亦歸順中之一人。此次反抗，實非出其本意。乃受潜伏土匪之教唆。⁸²

上述報導中，日方記載大多稱「主謀」是來自於馬武督的十五、六名「土匪」，部分報導更稱是十七位「土匪」，數量不一。⁸³ 報導並認為瓦旦·變促（瓦丹那毛）是受到煽動才再次反抗。「土匪」對其誣稱日本正與另一個強大的外國作戰，不久以後必將戰敗。加上承諾供給軍糧，種種因素讓當時擔心陸稻尚未收成的瓦旦·變促決心參與反攻。⁸⁴ 對於這段過程，瓦旦·變促的兒子樂信·瓦旦提及：

78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誌稿）》，（第一卷，下冊），頁 473。

79 〈蕃人襲插天山隘線〉，《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0 月 10 日，版 2。

80 〈插天山新隘勇線（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8 月 29 日，版 2。

81 〈蕃地暴動之形勢〉，《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0 月 19 日，版 2。

82 〈深坑隊殊功者（二），反抗土目之後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1 月 15 日，版 2。

83 〈插天山隘線蕃人之襲來〉，《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1907 年 10 月 9 日，版 2。

84 〈深坑隊殊功者（二）反抗土目之後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1 月 15 日，版 2。

其後明治 40 年（民前 5 年）為收復祖墳之地，與同志相謀，再復起奪回自大溪郡枕頭山經「ルブ」⁸⁵ 山到文山郡「リモガン」（現福山）之隘勇線，但由平地增援之日本警察隊反攻下，又歸日本手中。⁸⁶

上文可以看出樂信·瓦旦認為大豹群以及瓦旦·變促是主動發起攻擊隘勇線的「賦歸祖墳之地的計謀」，⁸⁷ 而非日方所謂的受到「土匪」煽動。至於文中的「同志」指的除了是北大崙崙群以外，應該也包含了「土匪」。然而，究竟這些蟄伏在馬武督社的「土匪」是誰？首先，就馬武督方面而言，1896 年 1 月 3 日臺北城元旦襲擊事件後，龍潭坡方面的江振元聚集近千人準備與日軍交戰，卻因籌備不足而一戰即敗。後續，江振元率領了四十餘名「土匪」藏匿於「蕃界」。⁸⁸ 1 月 29 日，日本步兵聯隊第五中隊進攻馬武督庄，焚燒民居住屋，並且掃平該地區以江振元為首的集團，「土匪」戰死十餘名。⁸⁹ 2 月 10 日，馬渡少佐率領部隊抵達古仔寮，燒毀「匪首」江振（元）的住處。⁹⁰ 後續，被日方稱為「逋逃淵藪」的馬武督社域在「土匪」被擊潰以後，泰雅族馬武督人又再度回返到該地，並往十股前進。⁹¹ 整體來說，馬武督的地緣條件與大豹群類似，皆鄰近漢人的屯墾區，原漢之間的往來密

85 文中的「ルブ」山（魯碧山），應為大豹群耆老口述中的 Quri Lupi（古里魯碧：有草皮的鞍部），位於插天山稜線上，大豹群耆老宗民雄口述，佳志部落，2019 年，筆者紀錄。

86 樂信·瓦旦著，伊凡·諾幹譯，〈臺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情書〉，1946 年 6 月 8 日。摘自：伊凡·諾幹，〈原住民族領土權、空間政治與轉型正義：以 Taye[Bngciq]（泰雅族大豹社群）為例〉，收錄於羅烈師等著，《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 年），頁 244-245。

87 伊凡·諾幹，〈原住民族領土權、空間政治與轉型正義：以 Taye[Bngciq]（泰雅族大豹社群）為例〉，收錄於羅烈師等著，《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頁 244-245。

88 臺灣憲兵隊編，《臺灣憲兵隊史》，頁 113。

89 林品桐、洪淵木、陳文添，〈匪徒狀況報告書〉，《明治 29 年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 6 輯（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7 年），頁 9。

9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上卷），頁 94-95。

91 〈五指山之林況（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 月 13 日，版 4。

切。馬武督領袖瓦旦·馬瀨曾經到七寮庄的周源寶家中說服製腦即為一証。⁹² 1899年，為了防堵「土匪」，日方發布「暫時禁止漢人進入山地，且要防止私下進入者」。⁹³ 同時，為了避免槍枝與火藥流入山區，日方全面沒收暗坑到馬武督之間沿山地帶漢人的武器，⁹⁴ 日方也從過去對原住民採餽贈交流的方式改為威壓主義。⁹⁵

除了江振元之外，馬武督方面較著名的「土匪」，要屬住在原住民部落，甚至娶了「頭目」之女為妻的徐阿滿（徐滿）。1903年，潛伏於馬武督社內的「土匪」與原住民預謀襲擊日方，但因為警備森嚴而作罷，最後轉向樹杞林支廳（竹東）的「蕃地」窩藏。當時已經歸順的徐阿滿，因為與藏匿「蕃地」的「土匪」聯繫而受到官方的注意。⁹⁶ 1908年，關於徐阿滿的記載如下：

咸菜礪人徐阿滿。著名之匪首也。常率其部下四出擄掠。明治三十三年間。因群匪大蒙討伐。彼遁逃無所。遂入馬武督社求為生蕃之馬牛。生蕃亦馬牛畜之。密使出為交換諸事。蕃社大得其便。乃以土目之女妻之。優待有加。⁹⁷

1907年的插天山隘勇線威脅到了北大崙崙群與大豹群，但由於馬武督群與前兩者有攻守同盟（Qutux Pahaban）的約定，加上隘勇線也間接威脅

92 王學新編譯，《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年），頁153。引自傅琪貽，《1900-1907大豹社事件，WatanSyat抗日事件》，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5，（臺北：原民會，2020年），頁66。

93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禁止進入山地之密令〉，《日據時期原住民政志稿（原名：理蕃誌稿）》，（第一卷，上冊），頁7。

94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禁止進入山地之密令〉，《日據時期原住民政志稿（原名：理蕃誌稿）》，（第一卷，上冊），頁7。

95 李靜慧，〈從贈禮到封鎖：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對北部山區原住民的認識與控制（1895-1909）〉（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75。

96 王學新，《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十九）：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中）》（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8年），頁1082。

97 〈蕃殺土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10日。

馬武督的生存，推測這是馬武督方面「土匪」策動反抗的考量條件。⁹⁸ 至於「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中的「土匪」是不是徐阿滿？根據報導，被稱為「蕃界大王」的徐阿滿是在 1900 年左右逃入馬武督社域。⁹⁹ 而日方記載煽動「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的是 1899 到 1900 年遁入「蕃界」的十五、六名「土匪」，兩者時間有所重疊。¹⁰⁰ 一直到 1908 年，馬武督方面尚有百餘名「土匪」。¹⁰¹ 然而因為歷年的隘勇線包圍，徐阿滿有了交出原住民首級以爭取能夠回到平地的意圖，因而遭惹殺身之禍。¹⁰² 雖然目前的文獻並不足以證實徐阿滿是否參與「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從徐阿滿與馬武督之間的關係，足以管窺寄居於馬武督社的「土匪」大致樣貌，也為彼時原民與「土匪」的互動提供理解的案例。至於馬武督「土匪」與大豹群瓦旦·燮促在此次堪稱緊密的結盟，則間接透露著大豹群與漢人之間長期以來的互動脈絡。

陸、「土匪」與大豹群之間的互動因素探討

淺山地帶的大豹群與漢人之間的關係向來頻繁。以安坑通谷為例，乾隆年間漢人移民移入上游大豹群「番地」開墾，以茶葉為主，開山撫番後官紳合作開墾，原住民的抵抗逐步降低。¹⁰³ 1887 年，劉銘傳以「背撫抗官」為由發布進剿「大坌」（大豹），雙方激戰於牛角坑。後續，清軍由外插角進入，「大坌」七社領袖雅威·燮促不敵，最後只能接受以林維源為主的漢

98 傅琪貽編，《大豹風華：泰雅族大豹群對日抗戰 120 週年紀念特輯》（桃園：大豹群族裔協會，2019 年），頁 57。

99 傅琪貽編，《大豹風華：泰雅族大豹群對日抗戰 120 週年紀念特輯》，頁 57。

100 〈插天山新隘勇線（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8 月 29 日，版 2。

101 〈蕃社大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6 月 28 日，版 2。

102 〈蕃殺土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7 月 10 日，版 5。

103 戴翊丞，〈清代臺北安坑通谷的族群空間分布與互動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頁 93。

人集團進入屯墾，待二、三年以後再以墾租的名義交付給「大埧」七社口糧。¹⁰⁴ 導致今日大豹溪流域留下了許多漢人軍事以及拓墾的地名，如大營、一百甲、二十四甲、田寮等。瓦旦·變促的後代多蜜·堂嘎（林富美）提到瓦旦·變促過去曾被漢人俘虜，因而居住在閩南人聚落數年的家族口傳。也提到瓦旦·變促一度被綁在十字木樁準備被殺，後來經由漢人通事救出之事。¹⁰⁵ 而林炯任也提到瓦旦·變促因為被漢人俘虜而會講台語，是導致後來大豹群與漢人結盟的遠因之一。¹⁰⁶ 除此之外，瓦旦·變促的曾孫林昭光（Botu Tanga）也提到：

日本佔領初期，還發生了「蕃匪」事件。那時的「蕃」指的是泰雅族，泰雅族被日本人稱為「生蕃」。臺灣「土匪」大約有五百人在新店、桃園敗給日本軍以後，求助於角板山的泰雅族。泰雅族重「義」，就將臺灣「土匪」藏了起來。¹⁰⁷

上述的「『蕃匪』事件」應是指「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林昭光特別指出了「重義」的觀念，相當值得探討。1903年警察本署成立「蕃務掛」¹⁰⁸，涉及原住民的事務直接「警察化」，「蕃務」與清剿「土匪」的單位合併，由警察體系指揮「蕃地」的隘勇線前進。傅琪貽提及，1903年獅子頭山隘勇線首要目標是防堵獅子頭山一個叫做 Kato 的「漢人對岸貿易集團」（『土匪』）與大豹群的聯繫，大豹群為了保護漢人集團起而抵抗，¹⁰⁹ 這似乎也是一種「義」的表現。隔年，桃園方面的白石山隘勇線前進，同樣抵達了大豹

104 傅琪貽，《1900-1907 大豹社事件：Watan Syat 抗日事件》，頁 52-54。

105 傅琪貽編，《大豹風華：泰雅族大豹群對日抗戰 120 週年紀念特輯》，頁 181。

106 林炯任口述，2017 年，三峽，筆者紀錄。

107 菊池一隆，邱昱翔、謝川子譯，《臺灣原住民口述史：泰雅族和夫與日本妻子緣》（臺北：秀威資訊，2022 年），頁 229-230。

108 藤井志津枝（傅琪貽），《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頁 166-167。

109 傅琪貽編，《大豹風華：泰雅族大豹群對日抗戰 120 週年紀念特輯》，頁 19。

群的西界，卻不見大豹群任何抵抗。由此可推知大豹群與獅子頭山「土匪」之間的密切關係。¹¹⁰ 細究這種「義」的關係，可能還存在著互利的結構，這就牽涉到了雙方互動的第二個因素：經濟。1899 年總督府的「蕃情」報告即指出，小暗坑、九鬮一帶庄民以及大稻埕陳有諒與大豹群締結山林開墾合約，雙方關係稍微親密。¹¹¹ 大豹群甚至有不越過位於成福的原漢交易處：「媽媽的家」（Ngasal Yaya）的默契，¹¹² 7 月，與原住民關係良好的海山堡麥仔園庄製腦業者陳國治，因受「土匪」潛伏而中止製腦。¹¹³

1900 年 6 月大嵙崁爆發嚴重的原住民襲擊腦寮事件，後續，村上義雄提出「絕對的封鎖主義」，主張將原住民周遭地區納入「關係的鎖閉主義」，封鎖彈藥、鹽、鐵、米的輸入。¹¹⁴ 村上的主張意味著將原民周遭漢人（包含「土匪」）的關係網絡切斷。其中，獅子頭山南麓緊鄰屈尺的渡口，即為傅琪貽所稱的「對岸貿易集團」對外交易之處。而大豹群便是由此補充外界的物資。¹¹⁵ 在〈安坑討伐〔伐〕一件書類〉裡，標示了獅子頭山（獅頭寮）「土匪」的位置，並顯示了通往塗潭渡舟處的小路（圖 7），可見其對外的具體路徑。1903 年獅子頭山隘勇線前進打破了雙方互利的網絡。1906 年日方「以隱匿土匪之名義（事實上係隱匿逃入大豹之平地同胞），擬定武力政策，開始討伐山地」。¹¹⁶ 進攻大豹群，此時雙方的互利關係可視為結束，改為原民庇護「土匪」的階段。

110 傅琪貽編，《大豹風華：泰雅族大豹群對日抗戰 120 週年紀念特輯》，頁 19。

111 王學新編著，〈明治三十二年八月份臺北縣景尾、三角湧辦務署有關蕃人蕃地之事務即情況〉，《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頁 141。

112 傅琪貽編，《大豹風華：泰雅族大豹群對日抗戰 120 週年紀念特輯》，頁 57。

113 〈蕃地腦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7 月 26 日，版 3。

114 傅琪貽編，《大豹風華：泰雅族大豹群對日抗戰 120 週年紀念特輯》，頁 66-67。

115 傅琪貽編，《大豹風華：泰雅族大豹群對日抗戰 120 週年紀念特輯》，頁 57。

116 樂信·瓦旦著，伊凡·諾幹譯，〈臺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情書〉，引自伊凡·諾幹，〈原住民族領土權、空間政治與轉型正義：以 Taye[Bngciq]（泰雅族大豹社群）為例〉，收錄於羅烈師等著，《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頁 244-245。



圖 7 獅頭寮一帶地形圖

資料來源：收錄於「安坑討伐〔伐〕一件書類（第一號、元臺北縣）」（1898-01-01），《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9117001，頁 75。

綜觀上述，大豹群與「土匪」前期的互動主要基於彼此相對的熟稔以及互利的經濟因素。此外，由於兩者皆生存在地形複雜的淺山地帶，促成雙方結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緣關係。大豹溪流域西北方為白石按山，緊鄰平地的十三添庄。北方以九鬮、暗坑、獅子頭山為界，沿山有「土匪」記載的位置舉凡白石按山南峰、阿四坑、雞罩山、十三添、打鐵坑、十六寮、暗

坑、車路頭、獅子頭山等地，全與大豹群有地緣關係（圖 8）。從 1898 年的〈土匪巢窟附近略圖〉看來（圖 4），「土匪」已經極為貼近大豹群領域。圖中「土匪窟小屋」位於「九空」附近一條名為「コロ」的河谷。而九空山在 1897 年就已記載有十六寮方面的「土匪」藏身。¹¹⁷ 九空又稱狗磴仔，位於今日大豹溪的十八洞天一帶，為 1906 年大豹社方面隘勇線桃園廳方面入侵的入口，也是後續接往阿姆坪的九空隘勇線的銜接點。¹¹⁸ 經實地勘查，上述的「土匪窟小屋」可能在今日五寮往北的野溪支流。根據世代居住於五寮的陳姓耆老表示，日治初期的菜園地與五寮山區「出土匪」，「土匪窩」位於五寮通往大溪的舊路附近，較靠近的大溪方面，¹¹⁹ 但是影響三峽山區居民頗深。¹²⁰ 由此判斷，「土匪窟小屋」位置偏遠，必要時可以往「蕃界」移動，又可外逃漢人社會，符合 James Scott 所認為的「贊米亞」（Zomia，遙遠的人）與逃亡者的聚落，具有邊緣性（marginality）以及機動性（mobility）等特質。Scott 形容這樣的聚落「許多只有猴子才能到達的地方，實際是匪徒和叛亂者的逃避所」。¹²¹

117 〈烏合無常〉，《臺灣新報》（日文版），1897 年 6 月 23 日，版 1。

118 〈九空新隘線前進〉，《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1906 年 10 月 21 日，版 2。另外，在地有一個「狗磴仔吐煙」的說法，只要早上溪谷的狗磴仔起霧，霧氣飄向大豹溪對岸的蛤仔窟，下午就會山洪暴發。三峽三十閔窪隘勇後代林先生口述，2022 年，三十閔窪，筆者紀錄。

119 推測為金瓜坑一帶。

120 陳姓耆老口述，2023 年，五寮（湊合），筆者紀錄。

121 Robert D. Jenks, *Insurgency and social disorder in Guizhou: the "Miao" Rebellion, 1854-1873*,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 11, 21, 131。引自：James Scott 著，李宗義譯，《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 年），頁 168-170。



圖 8 日治時期三角湧的獅子頭山一線，日人記載的「土匪」活躍點與大豹群之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筆者所繪，底圖為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引自中研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此外，海拔 857 公尺的獅子頭山也具有上述兩個特質。目前山上存在著不少洞窟，有「大土匪洞」、「小土匪洞」等，判斷可能是過去「土匪」所使用的空間（圖 9）。此外，山上仍有疑似壕溝、掩體、水井等，宛如小型的獨立王國（圖 10）。該山三面孤立、山勢險峻，只有往南的山脈稜線，可以直通竹坑山方面的大豹群領域，成為「土匪」與原民之間的往來路徑。1898 年〈安坑討伐〔伐〕一件書類〉附圖可以看到十六寮、十七寮、竹坑庄、大豹社到尾寮庄（獅子頭山下）的聯繫路線（圖 11），可以輔助說明以上觀點。而張瓊文也指出，獅子頭山到塗潭山一線，往北有一條一條的河谷地曾經是泰雅族進出的孔道，點出了該處既孤立又具有特定對外聯繫孔道的特點。¹²²

¹²² 張瓊文，〈土地、社會與國家：新店地區的空間性轉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24。



圖 9 小土匪洞（筆者攝）



圖 10 獅子頭山洞窟與「土匪」可能遺址，參考（前）臺北縣政府設於獅子頭山現場的說明牌

資料來源：筆者所繪，底圖為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引自中研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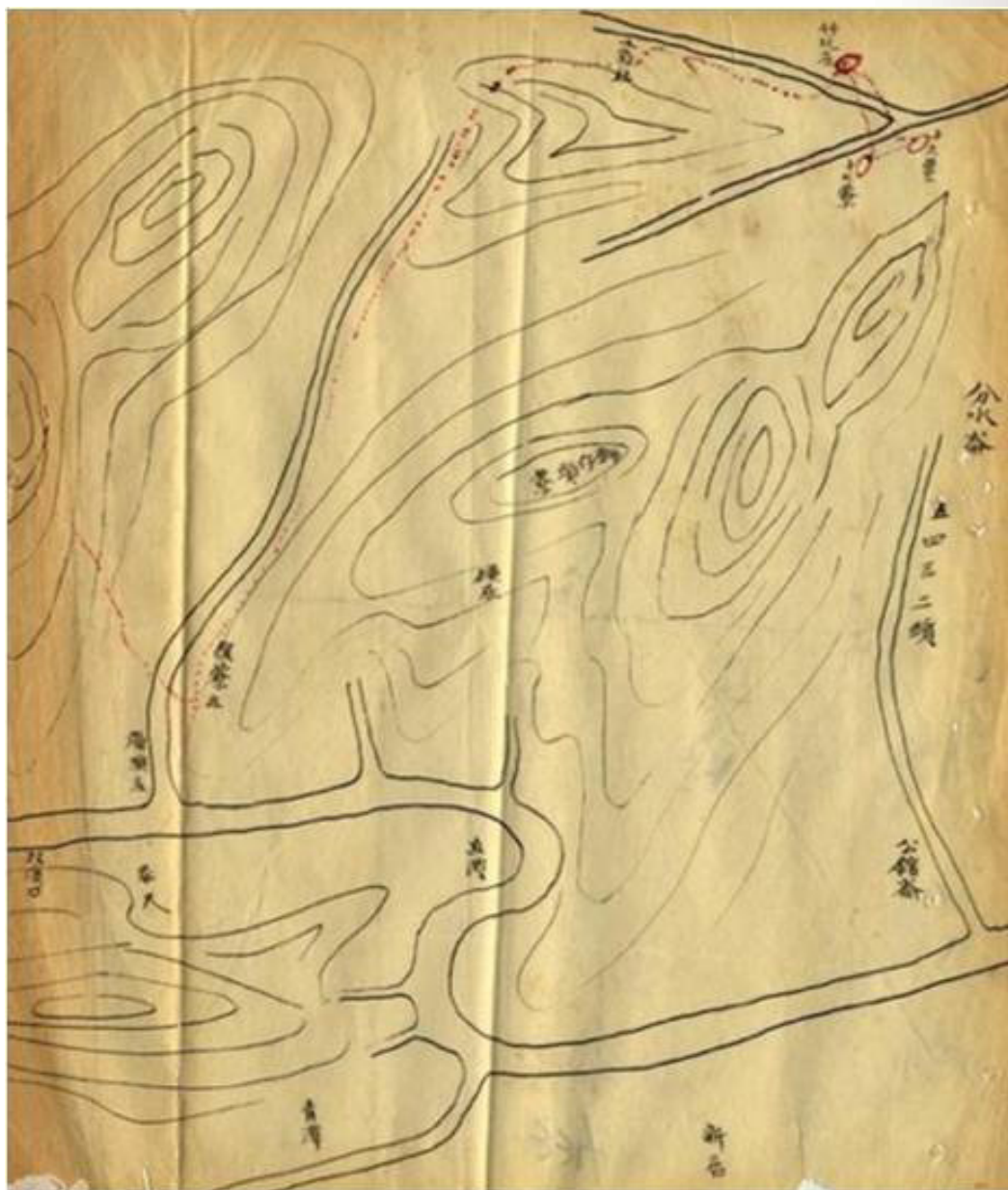


圖 11 十六寮、十七寮、竹坑庄、大豹社到尾寮庄（獅子頭山下）的聯繫路線

資料來源：收錄於「安坑討伐〔伐〕一件書類（第二號、元臺北縣）」（1898-01-01），《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9118001，頁 333。

另外，「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中泰雅族與「土匪」聯合佔領的控社分遣所（圖 12），也具有既邊緣又機動的特質。該山為插天山隘勇線西段的要地，三面孤立、一面留有通路銜接插天山，地理情勢與獅子頭山頗為類似。1907 年 10 月大豹群與「土匪」聯軍二百多人佔領此地，¹²³ 目的是針對不遠處的插天山隘勇線上的汙來隘勇監督所。¹²⁴ 根據實地探訪，海拔 890 公尺的控社分遣所遺址目前尚有八到十座到小不一之土凹遺址，山頂有可放置山砲的平台以及石砌排水路（圖 13、圖 14），有著如獅子頭山般適合長期固守的條件。從上述幾個例子可以看出，「土匪」往往選擇在靠近「蕃界」的山頭，或者兼顧邊緣性與機動性的戰略要地，易守難攻又能夠與原民互通有無，這樣的考量也暗示著「土匪」與原民之間存在著包容與共存的默契。



圖 12 〈插天山隘勇線〉，《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1907 年 10 月 14 日，版 3。其中，圓圈部分為控社分遣所，由筆者所註。

123 〈插天山隘線蕃人の襲來（三）〉，《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1907 年 10 月 11 日，版 2。

124 〈插天山隘線蕃人の襲來（三）〉，《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1907 年 10 月 11 日，版 2。



圖 13 控社分遣所現場的土凹遺址（筆者攝）



圖 14 控社分遣所現場空間圖（筆者繪製）

整體而言，大豹群與漢人的長期往來、漢人進入大豹群領域拓墾的歷史，加上因為同樣被日本封鎖所形成的經濟互動，成為「土匪」與大豹群互動的背景。其中，以地緣關係為最主要的因素。1907 年隘勇線包圍的狀況下，面對生存空間被壓迫到最後一刻時，正是地緣上的唇亡齒寒構成了雙方結盟並進行最後一搏。

柒、結語

傅琪貽認為 1896-1902 年是「土匪」活躍的時期，1907-1915 年則屬於「陰謀民族革命」時期。¹²⁵ 翁佳音則主張，1895 年 12 月 30 日到 1902 年 7 月屬於「各地土著勢力武裝游擊戰」，1907 年 7 月到 1915 年 8 月是抵抗殖民地基礎工事的「隱謀與暴動」，¹²⁶ 雙方都未特別提到 1902-1907 年間的狀況。然而，從本文可以發現，這段期間「土匪」雖然大致消失，卻仍有部分轉向內山並尋求原住民合作與庇護的跡象，「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中「土匪」的現身便是一例。特別是 1903 年隘勇線的警察化，以及同年的獅子頭山隘勇線，更加迫使「土匪」轉往山地。一直到「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為止，發現「土匪」與大豹群一直持續保持著關係。

至於雙方互動的模式具有以下幾個特徵：首先，對大豹群而言，面對來勢洶洶的日本，與素有敵對關係的漢人「土匪」結盟，具有「連結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之策略。而對於「土匪」而言，進入原住民的領域以尋求庇護的動機居多，「土匪」將自己「原住民化」之外，也展現自身的附加價值，對外引入物資與情報，藉以形成「互利」的基礎。雙方也因此呈現出非常時期的「共生」狀態。然而，由於這樣的「結盟」未見任何條約的形式，彼此間的互動仍然具有臨時性與不穩定性的現象。最後，本文為例，大豹群與「土匪」之間的關係，可以視為原漢原本既有的交往脈絡的延伸，這顯示

125 藤井志津枝（傅琪貽），《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頁 291。

126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研究（1895-1902）》，頁 2。

了在緊密的地緣關係之下，原漢之間並不是像既往歷史印象中的彼此對立、互相殺戮，而仍有一定的互動往來，以至於在面對外敵時能夠形成短暫的戰略關係。

上述的現象特別集中在北部的「土匪」與大豹群之間的關係，分析箇中因素，可以歸納為族群互動、地緣與經濟等因素。族群互動方面，清領時期大豹群領地一度被攻佔而成為漢人的開墾地，加上瓦旦·雙促與漢人之間素有來往，間接影響了大豹群與外界之間的互動。此外，如前所述，地緣關係在原漢互動中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三峽、新店山區自清領時期即為「土匪」活躍地帶。這一帶山區原漢交界地帶廣闊。在日方的壓迫下，「土匪」轉往大豹群領域尋求庇護是至為合理的選擇。經濟方面，雙方長期的貿易互動也形成了特殊的信任關係，前文提及的成福「媽媽的家」即為一例。反過來說，「土匪」與馬武督群之間的關係也堪稱密切，日治初期抗日「土匪」江振元甚至以今日的馬武督核心地帶為載地，瓦旦·馬瀨前往七寮庄周源寶家中說服製腦一事，也可推測部族與外界之間有一定的經濟往來。然而，與大豹群之間仍是不同的，首先是馬武督群與漢人之間的關係相對來說較為緊張。¹²⁷ 此外，就地理空間而言，馬武督傳統領域往西部之間基本上是以馬武督溪的牛鬥口（涵谷關）為隘口，往外則是石牛山、彩和山、盪鈹山與赤柯山所組成的屏障山系。而這一系列山系在日治初期即遭到日本隘勇線所漸次佔領，窄化了馬武督群與外界之間的聯繫。1907年插天山隘勇線的推進，威脅到馬武督北方，馬武督領域的「土匪」往北尋求與大豹群的瓦旦·雙促合作，推估也是在馬武督溪在面對西部的連繫通道遭到封鎖以後所做的決定，此一決定促成了日方所稱的「大崙崙蕃匪騷擾事件」的爆發，原漢聯軍最終雖然失敗，但也留下珍貴的一頁歷史。

127 梁廷毓，〈帝國侵略的前線：馬武督社在日治初期的抵抗與爭戰〉，《原住民族文獻》第五十期（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22年）。

參考書目

壹、專書

王明義等編，《三峽鎮鎮誌》。三峽鎮公所，1993 年。

王學新，《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十九）：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中）》。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8 年。

王學新編著，《日治時期臺北桃園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之一：理蕃政策》。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 年。

王學新編著，《日據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 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年。

王學新編著，《日據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 3》。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6 年。

吳德功，《讓台記》上卷。無出版資訊，1897 年。

林品桐、洪淵木、陳文添，《明治 29 年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六輯。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7 年。

林熊祥主修、黃旺成纂寫。《臺灣省通志稿，卷九：革命志抗日篇》。臺北：臺灣省文獻會，1954 年。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研究（1895-1902）》。臺北：稻鄉，2007 年。

郭嘉雄，《臺灣北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79 年。

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海峽學術，2000 年。

傅琪貽，《1900-1907 大豹社事件，Watan Syat 抗日事件》，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 5。臺北：原民會，2020 年。

傅琪貽編，《大豹風華：泰雅族大豹群對日抗戰 120 週年紀念特輯》。桃園：

大豹群族裔協會，2019 年。

菊池一隆，邱昱翔、謝川子譯，《臺灣原住民口述史：泰雅族和夫與日本妻子綠》。臺北：秀威資訊，2022 年。

臺灣憲兵隊編，《臺灣憲兵隊史》。臺北：臺灣憲兵隊，1932 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柏壘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治安狀況》（上卷）。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 年。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下冊），（原：理蕃誌稿）》。南投：臺灣省文獻會編印，1997 年。
日文原版為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第一編。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 年 -1938 年。

檜山幸夫、東山京子，《總督府檔案與臺灣統治》。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 年。

羅烈師等著，《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 年。

藤井志津枝（傅琪貽），《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臺北：文英堂，1996 年。

George L. Mackay，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前衛，2007 年。

James Scott 著，李宗義譯，《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 年。

水野遵，〈臺灣の土匪〉（1898 年發表），收錄於《臺灣論二》。東京，拓殖大學，2003 年。

作者不明，《三峽殉難警察官吏之事蹟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1935 年。

秋澤烏川，《臺灣匪誌》。臺北：杉田書店，1923 年。

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編著，《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上）》。臺北：捷幼出版社，1991 年。

貳、期刊論文或學位論文

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臺北：中央研究院，1973 年），頁 1-52。

李靜慧，〈從贈禮到封鎖：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對北部山區原住民的認識與控制（1895-1909）〉，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洪秋芬，〈日據初期臺灣的保甲制度（1895-1903）〉，《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1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年），頁 437-471。

張瓊文，〈土地、社會與國家：新店地區的空間性轉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梁廷毓，〈帝國侵略的前線：馬武督社在日治初期的抵抗與爭戰〉，《原住民族文獻》，第 50 期（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22 年 6 月）。

陳怡宏，〈《後藤新平文書》選譯：「臺灣之土匪」〉，《臺灣風物》，第 51 卷第 2 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2001 年），頁 13-46。

陳怡宏，〈乙未戰爭：臺人肆應與權力場域變動〉，《臺灣學通訊》，第 87 期（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2015 年），頁 18-19。

陳怡宏，〈忠誠和反逆之間：1895-1901 年間臺北、宜蘭地區「土匪」集團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陳明正，〈日治時期新店沿山地區的山林開發〉，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森田孝利，〈日本統治初期臺灣的治安維持制度〉，臺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戴翊丞，〈清代臺北安坑通谷的族群空間分布與互動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參、報紙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898 年至 1908 年。

《漢文臺灣新報》，臺北，1896 年至 1897 年。

《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臺北，1898 年至 1908 年。

《臺灣新報》（日文版），臺北，1896 年。

肆、網路資料庫

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網址：<https://stfb.ntl.edu.tw/cgi-bin/g32/gswweb.cgi/ccd=jesKtm/main?db=book&menuid=book>（2022/11/28 點閱）。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網址：<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2022/8/28 點閱）

中研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網址：<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2023/9/28 點閱）

伍、口述訪談

三峽三十閔窪隘勇後代林先生口述，2022 年，三十閔窪，筆者紀錄。

尤敏·樂信（宗民雄）口述，2019 年，佳志部落，筆者紀錄。

協靈祠不具名廟祝口述，2023 年，三峽協靈祠，筆者紀錄。

林炯任口述，2017 年，三峽，筆者紀錄。

林德桃口述，2018 年，上溪口部落，筆者紀錄。

馬瀨・有狩口述，2019 年，優霞雲部落，筆者紀錄。

陳姓耆老口述，2023 年，五寮（湊合），筆者紀錄。

黃肇宏口述，2020 年，基國派部落，筆者紀錄。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andits" and the Atayal Topa Tribe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era

Kao JunHonn *

Abstrac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the Han soldiers who were scattered following the defeat in Itsubi Senso (Yiwei War) joined forces with the “bandits” who had previously concealed themselves in the inland mountain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hich became a multifaceted military entity. On one hand, these “bandits” persistently harassment the local inhabitants near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they also aligning themselves with the cause of anti-Japanese nationalism. Under Kodama Gentaro’s “Penalization of Bandits” policy in 1898, they did not disappear; instead, they withdrew to the inner mountains and established an alliance with the Atayal Topa Tribe, resulting in the unique alliance between the Han Chinese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

This article centers on the Japanese efforts to combat “bandits” in the Sann-kak-íng (Sam-kiap-khu) and Amm-Kheng in the beginning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dditionally, it examines the “Takoham Bandit Harassment” in 1907, as referred to by the Japanese, which took place along the Jatian Mountain Pass Lin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bandits” repeatedly migrated to the territory of the Topa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Ar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ribe during 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It also investigates instances where these bandits formed alliances with the indigenous people to resist the Japanese forces together, drawing upon various sources such as literature, oral testimonies, and on-site investigations. Additionally, it examines the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and factor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m.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different spheres such as ethnic interactio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 and furth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teractions between "bandits" with the Topa Tribe and the M'utu Tribe

Keywords : “Bandits”, Topa, Defense Lines of Frontier Guards, “Takoham Bandit Harassment”, Geopolitics